

关中农村研究系列丛书

THREE VILLAGES
IN GUANZHONG PLAIN
OF SHAANXI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Guanzhong Plain of Shaanxi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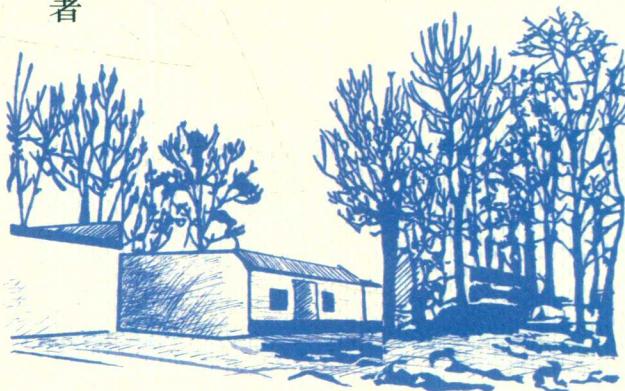
关中三村

城镇化进程中

关中农村社区发展研究

郭占峰

著



学
术
文
献

关中农村研究系列丛书

关中三村

城镇化进程中
关中农村社区发展研究

THREE VILLAGES
IN GUANZHONG PLAIN
OF SHAANXI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Guanzhong Plain of Shaanxi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郭占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中三村：城镇化进程中关中农村社区发展研究 /
郭占锋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11

(关中农村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9658 - 0

I. ①关… II. ①郭… III. ①农村社区 - 社区建设 -
研究 - 陕西 IV. ①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2891 号

关中农村研究系列丛书

关中三村

——城镇化进程中关中农村社区发展研究

著 者 / 郭占锋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任晓霞

责任编辑 / 任晓霞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社会学编辑部 (010) 59367159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218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658 - 0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本书得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固定观测点项目“西部农村
社会转型与乡村治理观测及支撑平台建设”的资助

丛书编委会

主任 付少平

副主任 张忠潮 朱宏斌 赵晓峰

委员 付少平 樊志民 张忠潮

朱宏斌 杨学军 赵晓峰

郭占锋 赵丹

丛书总序一

打造农村社会研究关中学派的 抱负应该肯定

——在第一届“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郑杭生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与 50 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者聚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美丽校园里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和经验探讨。重视青年学者的健康成长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中心议题，因为青年学者是中国社会学的希望。在这里，我要感谢青年学者的踊跃参与，也要特别感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领导、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的全体师生和我们基金会一起主办这次“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论坛”。

不久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办了建校 80 周年暨合校 15 周年的庆祝活动。80 年的风雨，80 年的沧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所国家重点建设的“985”“211”序列的农业院校，服务“三农”发展，也应该成为学校各文科学院系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方向。人文学院刚刚改名为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学校还将农村社会发展确定为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学科建设的两个主要方向之一，这说明学校非常重视中国农村研究，重视农村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令我们感到兴奋的是，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已经组织中青年教

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农村社会研究中心。通过中心编辑的小册子，可以看到，学院的这批年轻人非常活跃，短短三年的时间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批年轻人希望能够在学校、学院的扶持下，打造农村社会研究的关中学派，抱负很大，热情也高，还很有勇气。

在中国社会学会 2014 年 7 月召开的武汉学术年会开幕式上，我做了“学会、学派、学术”的致辞。我在致辞中指出，学派是学术发展的最实质性的平台。有无学派，特别是有无著名的学派，是一个学科是否繁荣、是否有活力、是否成熟、是否有社会影响力以至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农村社会研究中心虽然起点不算高，但是中心的老师们从一开始就有心要做成一个学派，确实不容易，应该得到肯定、鼓励和支持。

围绕这个问题，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讲三点意思。

首先，为什么要做学派，做什么样的学派。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关中地区的历史名人，关学创始人，也是理学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横渠先生——张载。早在北宋时期，他就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为学之道，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四句话，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什么要做学派，做一个什么样的学派，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可以从中汲取理论资源。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经济社会变迁中，经济快速发展，总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社会更在加速转型，这是我们所处的大背景。民族的崛起、社会的转型，为社会学学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会。目前，中央提出要提升国家软实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这就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难得一遇的好机会。然而，中国学术要有话语权，就需要不断深化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发出我们的声音，营造学术生长的空间。照搬西方

的理论是不能解释和指导中国实践的，必须要逐渐发展起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学派。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学派，又必须回应时代需求，在扎根中国改革经验、阐释中国发展实践的基础上生长、发展起来。

其次，就如何来做农村研究的关中学派，我想说一些我的思考。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写了一本重要的农村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农村社会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目前来看，这些研究成果依托的农村经验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比如华北农村、东北农村、华南农村、长江三角洲、湖北中部地区等，而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部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这就为西北地区的农村研究创造了学术生长的广阔空间。关中地区，在宋朝以前一直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具有悠久、辉煌的历史，是传统中国小农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因此，扎根田野，立足关中，面向西北地区，定能做出一批有影响力、有创造力的学术研究成果。所以，学院提出创建农村研究的关中学派很有希望，也很有远见。

2013年7月召开的中国社会学贵阳学术年会开幕式上，我做了题为《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的致辞。这里的三个“再”代表中国社会学必须面对的三种基本关系：中西关系，今古关系，理实关系——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只有把上述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借鉴西方，跳出西方”，不断进行“再评判”；做到“开发传统，超越传统”，不断进行“再认识”；做到“提炼现实，高于现实”，不断进行“再提炼”，我们才能真正创造我们的学术话语，创造我们的学术特色，也才能形成为数众多的中国学派。

2014年我在“学会、学派、学术”的致辞中，对什么是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做了进一步拓展，归纳为“三再、两气、一追

求”。“三再”，就是指“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两气”就是指“只有接地气，才能有底气”。从学术的角度讲，接地气至少可以分为三种：接现实中国的地气、接历史中国的地气、接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所谓“一追求”，就是追求“真善美”，社会学既要追求“真”，又要追求“善和美”。这里的“真”指的是科学性，“善和美”指的是人文性。用中国学术传统的说法，就是追求真善美，提升精气神。事实表明，社会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仅凭单纯的科学性，并不能发现其真实原因和解决办法，往往要靠人文性才能找到原因和解决之道。

可以这样说，今后中国社会学界的良性学术竞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这方面基本功的功力如何，能否在掌握有关事实资料的基础上，既高屋建瓴，又具体分析地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既能揭示世界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发展趋势，又能展现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中国经验，通过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通过接现实中国、历史中国和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通过把科学性与人文性有机结合，正确处理中西、古今、理实这三种基本关系，鉴别各种思潮，从而推动中国学派的建设，促进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并为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2014 年在陕西遴选了 10 个县 30 个村作为农村社会研究中心长期的固定观测点，听说将来还要在其他省市建立类似的观测点。只要能够长期坚持，立足关中这片土地，有理论自觉的精神，练好基本功，一定会有所成就。

最后，我想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我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的情况。基金会成立以来，先后资助了 34 个博士生项目、30 个硕士生项目，还资助了 90 位青年学者。其中，青年学者项目，2013 年就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的赵晓峰博士，2014 年又有学院的陈辉博士。青年学者项目，连续三年，每年都有

110~120位青年学者递交论文，我们每年从中选出30篇，应该讲这些论文的质量都还是很不错的，三次论坛都非常成功。

另外，我们还创办了两个刊物——《社会学评论》和《社会建设》。到目前为止，《社会学评论》已经出了10期，上了知网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已经被中国人民大学评为“C刊”。《社会建设》也在2014年3月得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批准，2014年出创刊号和第2期。《社会建设》范围很广，现阶段以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为重点。这两个刊物是我们社会学界共同的、持久的平台，这两个杂志的一个宗旨也是为青年社会学者搭建一个茁壮成长的学术平台，大家有合适的稿子也可以投给我们。我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下，这两个学术刊物，一定能够办成高质量的学术刊物。

预祝这次论坛开得成功，大家都有收获！

谢谢各位！

2014年9月20日

丛书总序二

关中农村研究的价值

付少平

关中，是陕西中部关中平原的简称，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及并大量使用关中地名的历史典籍应该是西汉时期的《史记》，其提及“关中”40余次。现在的关中地域，一般依据史念海、李之勤等编写的《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概述》中的界定：“指陕西中部秦岭以北，子午岭、黄龙山以南，陇山以东，潼关以西的区域。”关中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古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官——后稷教民稼穡于此，周秦汉唐十三朝都曾建都于此，这都与关中发达的农耕文明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唐末至宋以降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中国农业核心区向南转移，关中农业的地位才开始动摇。有史以来，关中地区就素以“八百里秦川”著称，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但是，如果翻开民国期间海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华南地区有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西南地区有施坚雅的乡村基层市场共同体的研究，华北地区有平野义太郎的村社共同体的研究、杜赞奇的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等等，有影响的研究唯少有西北地区的关中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虽对关中地区多有涉及，但少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是不是关中农村研究不具有代表性，没有价值呢？当然不是，关中农村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代表性，对于认识中国农村发展全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中农村的典型性与独特性，从历史的视角给予透彻分析的

是秦晖先生，秦晖先生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分析指出：第一，关中乡村发展模式具有典型性——“关中是中国‘黄土文明’的发祥地、封建社会与大一统国家的摇篮……当中华民族领先于世界各民族时，关中是灿烂中华的灿烂中心；当中国被世界近代化进程所抛弃时，关中又是停滞中国的停滞典型”。第二，关中乡村发展模式具有独特性——在传统社会中，关中农村发展具有许多独特的特点，如“宋元以后关中农村逐渐小农化，大地产与无地农民均减少，到民国时代，租佃关系几乎消失。这与通常所讲的‘两极分化’‘土地兼并’‘租佃经济’模式迥异。又如，明清以来，关中的租佃关系不断萎缩的同时，‘雇工经营’却颇有发展，但与之相应的却不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而是相对自然经济化的日益加深。再如，与商品货币关系斩断宗法纽带的一般推理相反，近代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东南农村宗族关系与族权势力最强大，而相对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关中农村反而相对少有活跃的宗族组织和强大的族权。但关中农民的自由个性与独立人格并不因此而得以比南方发达”。关中农村也从来没有过宗教狂热。因此，对关中农村发展模式的经验研究会有其“超经验”的意义。

钞晓鸿在《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和《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两篇文章中阐述了关中农村的独特性，他的研究发现针对一般所认为的商人广置田产、兼并土地的情况，“不置田地”却在陕商中极为普遍，无论是陕商购置田地的数量还是购置田地的商人人数，均较微少。“有能力兼并土地的富商非但没有兼并土地，甚至连自家原有的土地也懒于经营。”这与关中农村“慎终追远及家族聚居观念并不强烈”有关，“明清关中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家谱、祠堂、族田的相对稀少”。“宗族势力本身的相对衰弱便为其他组织与势力在当地社会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在关中基层社会治理中，商人成为重要的参与者，而商人参与地方治理，“宗法共同体在提供保护的同时，又遏制个体的独立性，将每一成

员均融到大家共同发展的步伐之中，这又不能不引起商人的反对”，因此关中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呈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对关中农村的独特性与代表性，贺雪峰先生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在《关中村治模式的关键词》一文中研究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关联，认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很大，从乡村治理的角度看，存在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依据在农户家庭以上是否存在认同与行动单位及存在什么类型的认同与行动单位，村治类型有所不同，“以户族作为基本的红白事单位，且户族事实上参与了户族内及户族外各种事务的关中农村，其村治模式与宗族型、家户型和小亲族型等村治模式，都有相当的不同，可以称为户族型村治模式”。关中的户族只是一个较小规模的以办理红白事为主要职能的行动单位，这种规模的行动单位，只能有限地解决村民之间的互助问题，它可以调解户族内的大部分矛盾，但户族一般缺乏对外的功能。

因此，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关中农村是具有典型性、独特性、代表性的农村地区，对关中农村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认识价值和指导中国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实践价值，关中乡村的典型性具有对与其相似农村地区的推论价值，关中乡村的独特性具有为宏观理论建立地域性个案积累的学术价值。但是无论在海外学术界还是在国内学术界，关注关中农村的学者还是非常少，对关中农村的系统深入研究非常匮乏。

所幸的是21世纪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开始聚集了一批年轻的学者，他们致力于认识和改造中国农村社会，致力于关中农村社会研究。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观测站基金的支持下，他们坚持每年深入关中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中研究关中农民，研究关中农村。他们中的一些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赵晓峰博士在他的研究中提出了“庙会是关中农村区域社会秩序整合的中心”的观点。2014年，已故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

社会研究中心参加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论坛时，特别以关学创始人、关中著名学者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的横渠四句勉励中心学者要秉持关学传统，深入开展关中农村研究。郑杭生先生还特别为中心留言：

关中学派传统深，
横渠四句是经典，
西北农研待继开，
青年才俊勇担当。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套丛书，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些富有朝气和理想的年轻学者对关中研究的成果。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富有朝气和理想的年轻学者一定会秉持关学传统，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开创关中研究和中国农村研究的新天地！

2015年9月

前　言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张之毅先生在云南农村进行了长达6年的社会经济调查，完成了著名的《云南三村》，这是继《江村经济》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云南三村》包括“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这三个村庄分别来自禄丰、易门、玉溪。《云南三村》的调查内容十分翔实，涉及农户的农作活动、农田分配、农田继袭、农田买卖、劳力出卖、职业分化、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等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费孝通在《云南三村》序言里讲道：“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穿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于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我们可以逐步地扩大实地观察的范围，按着已有类型去寻找条件不同的具体社区，进行比较分析，逐步识别出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也就是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更大的面，由局部接近全体。类型本身也可以由粗到细，有纲有目，分出层次。这样积以时日，即使我们不可能一下认识清楚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村，但是可以逐步增加我们对不同类型农村的知识，步步综合，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这种研究方法看来有点迂阔，但比较实际。做一点，多一点，深一点。我不敢说这是科学研究所社会的最好办法，只能说是我在半个世纪里通过实践找出来的一个可行的办法。”（费孝通、张文毅，2006：5～7）

自2011年从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毕业之后，我从大都市北京迁

至陕西杨凌小镇，这是一个位于关中平原上普通但不平凡的小镇。这里曾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业技术推广官员”后稷的故乡，他曾在此“教民稼穡，树艺五谷”，开创了我国农耕文明的先河。它亦是于右任先生于1934年创办的中国西北地区第一所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的诞生地。这座小镇虽然偏居西北一隅，但仍是中央部委高度关注的全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所在地。自进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工作以来，我就持续关注和研究关中农村社会，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关中农村社会研究在当前农村社会学领域内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于是，在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组建了一支年轻的关中农村社会研究团队，并成立了农村社会研究中心。2014年9月20日，我们承办了中国“第一届农村社会发展论坛”，并且邀请了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等农村社会学领域的学者齐聚杨凌，共同讨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问题。郑先生认为“打造农村社会研究关中学派的抱负应该肯定”，他对关中农村社会研究充满了信心。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付少平教授亦肯定了关中农村地区的典型性、独特性和代表性，并予以高度重视。同年，在学校及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农村社会研究中心从陕西省遴选12个县30个村庄作为固定观测点进行长期的跟踪研究，并与地方政府签订了10年的合作调研协议。

关中作为中国重要的文化区域之一，关中农村研究与华北农村、华中农村和华南农村研究相比，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国内社会学界也尚未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与论述。关中地处黄河流域，介于秦岭和渭北北山之间，西起宝鸡，东至潼关，东西长约300公里，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因其历史悠久，文化璀璨，历来被文人墨客所青睐。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三农问

题”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关中地区的农村与农民问题。其实，早在北宋时期就已有学者开始对关中地区的农民及农村社会展开了研究，并提出了许多优秀的思想，其中以陕西眉县张载的影响最大，他创立了关中地区的理学，自成学术体系，独具思想特色，后来被称为“关学”。“关学”的核心思想是重视躬耕实践，发扬实学之风，笃实重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是张载社会建设的纲领。以“井田、封建、宗法”为主干的“回复三代”是他社会建设的蓝图，为之他也付诸了实践，对关中地区的社会建设和民风民俗的形成意义深远。正如郑杭生先生指出的，“关中学派传统深，横渠四句是经典，西北农研待继开，青年才俊勇担当”，其不仅仅对张载的社会建设思想予以肯定，更以此来勉励关中农村社会研究者秉持关学传统，深入开展关中农村社会研究，为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贡献“关中力量”。

关中特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与文化习俗，早就决定了关中农村与农民研究是中国农村与农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世界农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中三村》中的村庄来自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故乡——韩城市。其选择受到费孝通类型比较法的启示，每个村庄的类型各有不同，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这对了解关中农村社会有着极大的帮助，也为后续研究关中农村社会变迁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数据和经验参考。

《关中三村》中的党村，是旅游带动型的社区发展模式。党村是一个具有近 700 年历史的古村落，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但是村落建筑群保存完整，村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有名望的商人和官员，村落文化亦是丰富多彩。然而，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建筑学家青木正夫才发现党村这些有价值的建筑群，并且联合陕西一些